

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蔡青竹

【提要】 中国共产党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高度重视总结历史,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党在百年历史上共推出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均诞生于重大历史关头,均通过总结历史促进了党的团结和思想统一,均极大推动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鲜明体现了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总结历史、开创未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是我们党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 历史经验 总结

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三个最重要、最权威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文件。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决议”形式系统总结建党24年的历史,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打下坚实基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着重总结党执政32年的历史,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更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决议》),在沿用前两个《决议》基本论述和结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点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个“历史决议”均诞生在重大历史关头,是总结历史、开创未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每一次历史的回顾都让党更加成熟,每一次经验的总结都让党的理论和行动更加贴近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的需求,也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和独特政治优势。

一、均诞生于紧要历史关头,顺应时势

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产物,都是党在紧要历史关头深刻总结和科学运用历史经验的典范之作。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追求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再到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党在总结自身历史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前进动力。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智能化趋势下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应对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CKS017)的阶段性成果。

(一) 中国共产党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有科学理论指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勇立时代潮头,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在一以贯之的探索实践中积极地运用历史思维、把握历史规律、形成历史自觉,从而真正推动历史进程。

1. 历史使命感要求具有历史思维

所谓历史思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对关键历史阶段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中获得启示。马克思特别关注历史大变动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这些时期的历史现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发人深省。他就此写下不少名篇,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中世纪生产状况近乎白描式的解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分析,以及《资本论》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记录,都是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酝酿、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形成于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当时,共产国际已宣布解散,国民党政府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向党施压,党亟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第二个《决议》制定于我们党实现伟大转折、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之初。当时,全党同样亟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到正确轨道上,团结一致向前看。第三个《决议》诞生于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此时,党和人民已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亟待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从而更好地开创未来。在以上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党都通过“历史决议”这种权威、郑重的方式,科学回顾历史、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吹响了走向未来、开拓奋进的新的集结号。

2. 历史使命感要求深刻把握历史规律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①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有生命个人的存在及其现实活动确认为一切历史观都应具有的共识性前提。现实的历史之所以可认识、可把握,源于它的物质性和客观性。沿着这条认识线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感的深层来源。

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深层动力不是重建天赋人权,不是完善抽象理性,而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服务于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条最根本的历史进步规律,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真实保障。第一个《决议》运用唯物史观来思考中国革命的规律,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即“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②要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第二个《决议》同样着力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譬如,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生产关系在性质上已经与生产力相适应,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到如何促进落后社会生产的进步上。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体制保证。第三个《决议》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从历史发展的主线来看,党百年奋斗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② 毛泽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页。

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上升为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按照“两步走”战略,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 历史使命感催生一以贯之的历史自觉

唯物史观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认知功能,更具有推动历史、改造历史的实践属性。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和解决在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三个“历史决议”就此作了深刻诠释。

通过总结建党以来24年历史,尤其是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党明确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32年历史,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党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通过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尤其是总结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及新鲜经验,党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历史已经证明,前两个《决议》都是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而第三个《决议》同样是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更为突出。

(二) 中国共产党有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党把历史看作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和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把自身实践看作是不断直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时时加以总结、调整,把从实践中得出的新鲜经验提升为理论,再用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检验和发展,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1. “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高度统一

从百年党史来看,重视历史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经验教训,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对自身历史的回顾总结包含党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中国实际的新认识。

党起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为有限,处理复杂问题经验不足,尤其是党内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以致在探索实践中遭遇曲折。比如,从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①再如,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日渐成为党内共识,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在党内仍有不小影响。又如,毛泽东晚年高度重视防止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但他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从理论到实践都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都说明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说明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极端重要性。

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党在总结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最宝贵的思想成果。第一个《决议》是成功的开篇之作。它的起草是在延安整风背景下、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① 毛泽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3页。

集体学习和研究党史,不少高级干部还参加了《决议》的修改和讨论。《决议》对建党24年来的历史作出正式结论,对“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来了一次大扫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深刻总结了党的奋斗经验和优良作风,标志着我们党已走上成熟。第二个《决议》着重就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阐释,并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探索、新实践,强调全党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揭示了继续推进理论创新这一重大命题。第三个《决议》更加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以大历史观对党的百年奋斗史进行回顾总结,重点总结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新鲜经验,并科学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有不少新概括、新论断、新认识,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问题。

三个“历史决议”本身也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毛泽东自己说过,第一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但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不一定完全正确,“还可能有错误”。^①参与第一个《决议》起草和定稿的胡乔木也认为,该文献对历史事实讲得过多。^②出于维护中苏关系的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出版《决议》时,对其中的一些表述作了修改,如删去“毛泽东思想”的用语、增加斯大林名字的次数等。^③相比之下,第二个《决议》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前后写了一年多,对讨论稿一再修订。邓小平用两个“相当”评价文件起草过程,即“相当认真、严肃”“相当仔细”。^④第三个《决议》在时间跨度、视角广度和实践高度上都把总结党史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关于我们党前60年的历史,该《决议》的表述与前两个《决议》相衔接,沿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将重点放在新时代。根据党中央部署,在广泛征求意见后,起草组经反复研究推敲,对文稿作了547处修改。

2. 所得出的历史结论在重大关头发挥“压舱石”作用

三个“历史决议”所得出的历史性结论,都是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每一次作出历史结论、统一思想,都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压舱石”作用,为开创未来作了很好铺垫。

前两个《决议》的核心结论都是党在经历起伏曲折后经过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第一个《决议》诞生前,党经历了大革命运动失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及皖南事变等,付出了惨痛代价;第二个《决议》问世之前,党先后出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倾错误,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其实,在这两个《决议》推出之前,党都曾对“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和反思,但由于没有从思想方法、思想根源的高度在全党范围内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进行深刻总结,导致人们的思想并不统一。“左”的东西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一再出现,造成干扰和困惑。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⑤起草第二个《决议》的初衷,也是要借此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作出结论,以统一思想,引导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在

①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② 参见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3—94页。

③ 参见石仲泉《两个〈历史决议〉与党的百年华诞》,《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4期。

④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⑤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强调,对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最核心的内容,这部分如果写不好,整个决议就失去了意义。他还强调,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历史也势必要写。^①这两个《决议》,一个彻底解决了关乎中国革命全局的路线问题,一个彻底解决了党和国家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后如何继续向前走的问题,使全党紧紧围绕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开拓未来。

如果说前两个《决议》更多是党对过去所经历曲折的深刻思索,那么第三个《决议》则是成熟自信的党对未来大势的主动把握。党深刻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辩证互动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和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至关重要。经过一百年风雨磨砺,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整装再出发,更需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认清历史方位、把握历史规律。第一,《决议》基于这一认识逻辑,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流主线、主题本质,梳理出党百年历程的演进脉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新飞跃的发展轨迹,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变化,重点总结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最为宝贵的是,《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新阐述,尤其是作出“两个确立”这一新概括,阐明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作出“两个确立”这一新概括并写入《决议》,是十九届六中全会在理论上的一大亮点和突出贡献。第二,从大历史观角度,高度概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系统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这些概括贯通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阐释了党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及人类社会之间发展的紧密联系,深刻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

二、均起到统一思想向前看的作用,指向明确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过,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并不容易,更何况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无止境。党始终牢记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起到凝聚和振奋人心的作用,故而能做到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阔步走向未来。

(一)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主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考察历史的基本原则:从现实而非概念、想象出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历史时,无论教训还是经验,都重在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对事物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评价人物和事件不是为了就事论事,更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为了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真正汲取教训、增长经验。

第一个《决议》的重点是清除“左”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毛泽东精辟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②《决议》详细剖析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通过正确路线和错误路

^① 参见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299页。

^②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6页。

线的对比,让全党对党的发展历程和历史问题形成共识。第二个《决议》的主要任务同样是清除“左”的影响,从而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能写过头,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个《决议》的历史背景与前两个《决议》有所不同。用该文献自己的话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①因此,第三个《决议》主要通过总结成功经验来统一思想、鼓舞人心,把着力点放在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通过全面总结党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造,得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正确性,以及新时代在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标示性意义。

应该看到,党的“历史决议”具有双重内涵。就性质而言,它并非纯粹的叙述性历史研究,而是关于历史问题的论断性政治文件,其重点是阐明党的理论及政治观点,而非纠缠于具体历史事件,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内容而言,它超越一般性的历史研究,对历史问题达到一种认识上的升华,是历史研究、党史研究进一步开展的出发点和重要的指导原则。源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第一个《决议》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处理会在详略上有所取舍,为何第二个《决议》要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28年党史的段落,为何第三个《决议》要把重点放在总结新时代。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方式,《决议》在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方面的政治功能尤为突出。

(二)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真理的追求,会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认识的不断提高、材料的日益丰富而趋于完善。所以,党在把握自身历史时,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避免纠缠于细节,采用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原则,即邓小平所说的“宜粗不宜细”。这种方法是符合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规律的。

在具体历史事件上,采用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一是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第一个《决议》没有写明“左”倾错误路线在白区和苏区给党造成的具体损失,没有论及人品和宗派问题等。在毛泽东看来,对历史问题要格外谨慎,宁可《决议》有缺点,也不能留下错误。^②与党取得的伟大成绩相比,这些错误仅是一些部分的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更加坚强起来。^③二是矛盾的辩证的观点。唯物史观反对对事物采取“要么是、要么否”的僵化态度。譬如,第一个《决议》对博古等人不是一概否定,认为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是正确的。第二个《决议》也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客观指出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既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又明确指出对毛泽东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三是全面的系统的观点。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④第一个《决议》在阐述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都采用了全面的观点。第二个《决议》把毛泽东一生与他的晚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林彪及“四人帮”的罪行、毛泽东个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大革命”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9、61页。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2页。

③ 毛泽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页。

④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了清晰区分,对毛泽东思想所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概括,从而旗帜鲜明地清理“左”倾错误,又有力抵御了右的错误思潮。

在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上,着眼于历史各个阶段的联系,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方向。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重要的是树立起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推出第一个《决议》,旨在使党统一思想,以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决议》是以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方式,让全党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个总的认识。与第一个《决议》集中总结某一时段的历史相比,第二个《决议》在起草过程中吸收陈云同志的意见,打破原先的写作思路,开篇专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的历史。这其实是提出了要把前后历史联系起来认识的课题。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过程,不能人为地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正是基于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第三个《决议》贯通党成立至今的百年历史,核心内容由主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变为主要总结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对十八大之前党史的表述与前两个《决议》相衔接,聚焦当下正在做的事情。

(三)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

三个“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充分彰显了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它们都是在党中央尤其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统筹下,经严格的组织程序慎重作出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凝聚全党力量、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功能。

凝聚全党力量首先要维护党内团结。有了党内团结,才有迎接各种风险挑战的组织保证。第一个《决议》诞生于革命斗争“以弱搏强”的关键节点,毛泽东把党内团结视为党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①基于当时各个根据地在地理上的区隔,毛泽东认为应该承认其作为中国社会特殊产物的现实情形,“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②第二个《决议》诞生于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党内思想认识存在分歧的敏感时期。出于营造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的考虑,对“文化大革命”等的评述不再沿用“路线斗争”概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上促进了党内的团结统一。第三个《决议》诞生于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一百年来,党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本身就是一个团结鼓劲的文献;特别是在理论上作出“两个确立”新概括,有利于真正把党团结凝聚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

凝聚全党力量还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就组织部署看,党的领导核心极为重视,付出巨大心血。毛泽东始终关注第一个《决议》的起草,后来直接主持,字斟句酌,对文稿作了七次修改。邓小平是第二个《决议》的实际主持人,先后十六七次约见相关负责同志,《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对重大问题的把握都是由他最终决断的。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三个《决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确定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决议》全面吸收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通篇融汇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新思考、新认识、新谋划。

就起草过程看,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征询意见,反复讨论修改,体现了全党意志。第一个《决议》在正式起草前,已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高级干部中进行了数次关于党史的讨论。如此深入地讨论党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果算上正式起草前的讨论准备,第一个《决议》的

^①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② 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6页。

起草历时近四年。第二个《决议》前后写了20个月,其间经历党内4000人讨论、52位老同志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邓小平、陈云对决议内容发表讲话十余次。文件的工作过程稿共有七稿,并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征求意见。第三个《决议》的起草历时八个月,包括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并据此对文件作了547处修改,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三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专门进行审议。

从程序看,三个文件都是经党的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为七大顺利召开奠定思想基础;第二个《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为十二大顺利召开作了很好铺垫;第三个《决议》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为二十大顺利召开打下坚实基础。

(四)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立场

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第一,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第一个《决议》充分肯定了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密切联系群众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第二个《决议》强调一切巨大成就是党和人民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并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便是群众路线。第三个《决议》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五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被列为第一条,“坚持人民至上”则被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经验之一。第二,以人民利益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得出顺乎事理、合乎民心、贴合实际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态度,才能超越个人恩怨和主观情绪,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历史问题。从这一思想高度出发,党对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路线及其深层次社会根源作了深刻剖析,对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了深刻解析,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作了科学评价。三个“历史决议”说明,一部党的历史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历史。

人民的立场就是实践的立场。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从此拥有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万能钥匙”。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完整呈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具体实际的认知在实践中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由于中西国情的巨大差异,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而“左”倾教条主义一度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汲取历史教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中国革命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探索前进中也经历了曲折,出现了急躁冒进以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通过推出第二个《决议》,党在指导思想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全力转入改革开放,在搞建设上成功走出了一条新路。第三个《决议》以回望百年路、奋进新时代作为总基调,以大历史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号召全党努力在新征程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可见,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国具体实际也好,都不是凝固不变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认识对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

三、均极大推进了党的事业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百年党史是一个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接续探索、不断向前的历史进程,历史、现实和未来是贯通的。通过回顾和总结历史,党汲取历史智慧,阔步走向未来。三个《决议》是三个里程碑,清晰勾勒出党砥砺前行、铸造辉煌的奋斗足迹,也忠实记录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 均极大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

一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宝库,展示出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党走过的一百年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百年。在面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百年中,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三大重要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前两个《决议》都是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历史地位展开的。第一个《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直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①“毛泽东思想”随后在七大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决议》通过科学阐释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相剥离,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全面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逐步构建起来的。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第二个《决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承前”是指《决议》对于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述,主要是在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期间所作的重要论断的指导下形成的。“启后”是指这些思考在《决议》中得到再度雕琢、深化。《决议》首次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要点概括为十点,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所着力解答的问题。^②

第三个《决议》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节点,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明确调整为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这个定位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科学论断。如果说前两个《决议》分别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呼之欲出”,那么第三个《决议》则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写入党章的情况下,用“十个明确”对其核心内容作出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理论结晶。

二是有力提升了党总结自身历史经验教训的水平。

为什么要不断地总结历史?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科学认知建立在充分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总结历史经验的能力不断提高。三个《决议》均代表了当时党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

第一个《决议》可谓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党通过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中枢,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的地位,但未及时对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进行清理、作出结论。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逐渐成熟,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发起延安整风运动,号召并组织全党特别是干部认真研究党的历史,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

^① “毛泽东思想”概念于1943年7月由王稼祥首次提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原文也明确出现“毛泽东思想”等表述,但《决议》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毛泽东本人删除。相关具体情况及原因,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5—326页;石仲泉《两个〈历史决议〉与党的百年华诞》,《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4期。

^② 夏春涛《从百年党史看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3期。

由此基本弄清了党史上的是非问题。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第一个《决议》对建党以来的历史作出正式结论。在百年党史上,这是第一次系统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开创了党运用“决议”的理论和组织权威来统一认识、推进事业的先河。

第二个《决议》延续并发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认识成果。粉碎“四人帮”后,如何尽快摆脱十年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全国展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个《决议》正是在此背景下推出的,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扫除发展的思想障碍。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有个评价,认为《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表示“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①《决议》对历史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等问题的认识,均达到一个新高度。

第三个《决议》是在全党深入开展“四史”尤其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下推出的。“四史”学习教育是在建党百年之际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教育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由此可见前两个《决议》的权威性及其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重要场合对党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刻论述,体现了对党史的新认识。第三个《决议》充分体现了这些新认识。《决议》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条,着实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认识高度。

(二) 均在实践上极大推进了事业发展

一是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加强,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

加强政治建设对党极为重要,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为党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一再印证。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邓小平一再强调党中央要有权威,中央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他在1989年分析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②中央涣散无力是党在早期屡遭挫折乃至濒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第一个《决议》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肯定了毛泽东在其中所作的卓越理论贡献,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七大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起草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再三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将之视为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决议》最终也很好贯彻了这一原则,从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文件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起了不可替代的指导和主导作用,实际上起了核心作用。他后来分析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

^①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页。

^②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定的。”^①

第三个《决议》贯穿全篇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两个确立”。“两个确立”深入人心,早已成为常识和共识,正如《决议》所说,“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②作出这一新概括,写入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决议》,成为历史性结论,其权威性是不可比拟的,对我们党继续奋进新时代具有战略意义和奠基作用。

总之,百年党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全党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党的事业就会高歌猛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三个《决议》的问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大推进了党的事业。

二是迅速打开新局面,党的事业发生历史性转变。

如第三个《决议》所概括的,党在百年征程上带领人民实现了四个伟大飞跃,三个《决议》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一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一个《决议》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进而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第二个《决议》形成于第二个伟大飞跃到第三个伟大飞跃之间,起到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三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三个《决议》系统总结党的百年光辉历程,重点总结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③三个《决议》均鲜明体现了这一理念。按照大体每30年推出一篇历史决议的节奏,第四个《决议》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推出。届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如期实现。这令人无限憧憬。

(作者蔡青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
浙江省重点智库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311121)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徐志民)

①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6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SUMMARY OF ARTICLES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 Cai Qingzhu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ical past , and is good at gaining the inspiration to move forward. It is the Party’s creative endeavor to synthesiz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resolutions”. The Party has issued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its 100-year history. Thes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were all born at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 They all promoted the Party’s solidarity and ideological unity by re-examining history ,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nd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y all shone with the brilliance of Marxist thought; they are the embodiments of the materialist outlook of history and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st; they are significant document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for reviewing the past and projecting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microcosms of the Party’s magnificent and inspiring century-old struggle.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Writing of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Xie Huiyuan

Before 1949 , the writing of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ent through its early stage of explor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scholars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d the idea of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nd some scholars put this idea into practice before and after debates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writing of Marxist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as become stereotyp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is period , scholars often sublated evolutionary history ,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t of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basically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lso became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people to judge the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y asking whether or not it adopted the theory of five social forms. This periodization based on social forms is a reflection of Marxist scholar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s of history. It is a self-consistent response after “society” is endowed with “natur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 Wang Gaixin

It is necessary to embrace a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those who study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is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istory , which specif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sty replacement and the use of history as a guide , the establishment of dynasties and the divine historical view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for politics ,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ncept of grand unification , all of which reveal the linkage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dynastic politics. Second i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ur-category thought. The four categories of *jing* (classics) , *shi* (history) , *zi* (philosophy) , and *ji* (literary collections) are often mutually inclusive and mutually influenced , and the four categori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 , historical compilation ,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 and etc.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must be examined. The third is the multi-ethnic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history , the historiography of anci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historiography ,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hould also be a multi-ethnic